

建立传播高品位中华文化的新园地^{*}

——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 4 年回顾

蔡 萍

2001 年 1 月 1 日，国家图书馆分馆重新开馆，文津讲坛在分馆开坛讲座。第一讲是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主讲《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

“历史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的文化理念，将贯穿讲坛始终。

2002 年 1 月 1 日，国家图书馆分馆重新开馆一周年，文津讲坛成功举办了第 100 期讲座，同时举行《文津演讲录》系列图书第一辑首发式。

2003 年 1 月 1 日，文津讲坛两周岁生日。这一天，文津讲坛正式挂匾，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匾仪式。

从此，文津讲坛确立了自己大历史大文化系列讲座的品牌，开启了文化讲座的新篇章。

2004 年 1 月 1 日，是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开办第 4 年伊始，举办了第 200 期讲座暨回顾展开幕式。

四年来，文津讲坛共举办文史、政经、音乐、建筑、书法绘画、文博考古等各个领域的讲座 240 多场，结集出版了系列图书《文津演讲录》四册，听众达 4 万多人。到国图听讲座，已成为京城百姓提高文化生活质量的好去处。文津讲坛作为国家图书馆的文化品牌，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职能，让广大读者听众能亲眼目睹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们的气质风采，亲耳聆听他们学养深邃的精辟见解，还能向他们当面请教，解惑释疑。正像《虹》杂志主编曹作兰代表读者所说的：“在这里(文津讲坛)没有推销，没有炒作，是一块文化的净土和圣地。”全国人大团委书记张宏先生更是语意真切地说，文津讲坛的讲座“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文化信息，改变了长期形成的图书馆即藏书楼的观念，扩展了图书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功能，充分体现了馆领导的发展眼光和学术气度，也充分表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改革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意识”。文津讲坛被文化部定为有特色的文化工作之一，并拨专款对文津讲坛的相关设备进行更新与充实。讲座的实践告诫我们，坚守这一舆论阵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先进文化的传播，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民族复兴的必然。

^{*}原文刊于《贵图学刊》2006 年第 4 期。

1、文津讲坛的理念和品牌

近百年来，文津楼吸引了众多学人、学子在此焚膏继晷、白首穷经。今天，她以自己的魅力，成为文津讲坛文化品牌硬件的外在形象。文津讲坛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和培育“爱国至尊”、“爱国至贵”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增强民族凝聚力为目的，注重不同层面读者听众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主讲内容具有思想性、学术性、综合性和普及性。

文津讲坛坚持“高品位、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化精神，号召、吸引和凝聚了京城内外老中青三代学人，前来演讲的学者中，历史和考古界的先生有何兹全、邹衡、徐莘芳、李学勤、王晓秋、李伯谦、殷玮璋、王宇信、杨鸿勋、裘锡圭、李文海、陈高华、来新夏、龚书铎、宁可、朱凤瀚、王震中；文化艺术界的先生有文怀沙、启功、华君武、方成、周汝昌、叶嘉莹、英若诚、王蒙、袁行霈、柳鸣九、袁良骏、张玉书、乐黛云、闻立鹏、李致忠、徐世澄、王镛、严良堃、秋里、刘诗嵘、吴祖强、卞祖善、郑小瑛、胡德风、韩美林、李璠、陈长林、李祥霆、蒋巽风、钱满素、陈平原、周维、韩毓海；文博界的先生有朱家溍、杨伯达、杨新、孔祥星、杜迺松、罗哲文、王启泰、史树青、吕济民、孙机、杨臣彬；哲学社科界的先生有任继愈、汤一介、庞朴、钱逊、叶朗、方立天、方克立、叶秀山、楼宇烈、张立文、葛荣晋、陈来、周国平、葛兆光、郑家栋、陈筠泉；经济学界的先生有厉以宁、董辅初、萧灼基、吴敬琏；以及其他各界知名学者白春礼、何祚庥、江平、柳传志、施用海、王通讯、何传启、梁从诫、赵忠贤、吕敏、吴新智、秦伯益、郭耕等先生。他们不仅代表着各个学科、各个文化层面的学术水准，也代表了文津讲坛的文化品位。

学界前辈传道授业，说古论今；学界后生，风华正茂，独领风标。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读者更是不管风吹雨淋，酷暑严寒，都会提早赶到会场，或占一桌一椅，或席地而坐，高师演讲，他们静心凝神，谦恭有加，惟恐漏听漏记。每当先生走下讲坛，立刻被听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中间，先生顾不上讲座后的口干舌燥，继续为求知学子解难答疑，签名留言。文津讲坛已成为人们追求新知识，渴望真善美、净化心灵的一块绿地。听众几乎众口一词：“专家学者带给我们的知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广博学识，让我们感到震撼。”正像一位学者的留言：“天禄石渠，如入宝山”。

有一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小井村的普通农民苏景生，今年 69 岁，是 50 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改革开放后，成为京郊农村有名的“养殖大王”。平时一有机会，他就来文津讲坛听专题学术讲座。当他得知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资深农村问题专家吴象老

先生来分馆“再谈‘三农’问题”，他便从京郊早早地赶到了。有人问苏景生老汉：“您这大岁数了，为啥不呆在家里享清福，还要大老远的跑来听讲座？”他的回答是：“不是常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吗？我虽然年纪大了，但现在正好有了空闲时间，我要通过听一些专家、学者的讲座，开阔视野，启迪智慧，学到更多的新知识。必要时，还能帮助乡邻们办点事呢！”

2、文津讲坛的社会认同

国家图书馆创办的文津讲坛讲座历经短短四年，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和产生的效果，已远远超出她创办之初的预想。四年来，讲座几乎座无虚席，有时会出现无处下脚的爆满场面。如：张岂之《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下的中华文化定位》、方立天《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国民素质的提高》、钱逊《儒学与人生》、陈来《儒学“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启功《清代学术问题私见》、朱家潘《清代礼俗》、任继愈《中国历史的曲折前进》、周汝昌《从中华文化看〈红楼梦〉》、何祚庥《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成就》、王震中《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邹衡《中国文明的开始》、李伯谦《从考古学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形成》、萧灼基《发展是中国经济的主旋律》、厉以宁《中国加入 WTO 以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董辅初《发展中国私营经济问题》、王蒙《〈红楼梦〉纵横谈》等等。

文化需要继承的是它的核心和灵魂。渗透在各种文化形式里的，让中华民族历久而不衰的雄厚的文化底蕴，参加讲座的先生们无一例外地向我们阐述了这一民族精神。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很需要这样的讲座和这样的公众知识分子，社会大众发自内心的欢迎他们。而文津讲坛正是顺应了广大公众渴望知识分子走向社会大讲坛这一社会需求，使知识分子跨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在更深广的知识背景里建构自己的学术，寻求更开放、更丰富的精神支援，培育起更博大的人文关怀、更深厚的知识根底，让自己的学术超越学科的界限，把知识转化成生产力，使之变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产业，在更广阔的领域里产生效应。应该说，在知识分子引领公众学习的过程中，听众读者群中确实少了些浮躁，多了些理智。正如许多读者反映的，“听讲座让我们找到了一种有价值的消费方式”。因此，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举办大历史大文化讲座，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上都起到了正视现实、促进社会舆论向正确方向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办讲座是个好形式，特别是文津讲坛揭牌以后，应该向更高层次迈进，增加讲座内容，提高讲座质量。用讲座这一形式，完善国家图书馆宣传教育职能，让每一位国民把读书、求知、求真当作自觉的追求，营造一个真正的书香社会。

3、文津讲坛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

中国文化是极具个性的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异域文明所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古文化最早传入的就是东方的朝鲜、日本、越南及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地理的关系，在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直到风俗习惯、社会风貌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许多学者把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日、越等国家划在一起，统称为“中国文化圈”，或称“汉文化圈”。

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不仅给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巨大影响，而且西传欧洲。公元 9 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就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意大利。马可·波罗在元朝做官十七年，回国后，著述了《马可·波罗游记》。至此以后，中国各类文化典籍相继流转或被翻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北欧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收有中国大量的古籍和各类文物。另外，因中国东晋的《女史箴图》、唐代的《历代帝王像》和《送子天王像》等重要美术作品流寓西方，而使西方画坛感染上中国画风；甲骨文片和敦煌经卷与壁画被盗西方及日本，而成为世界两大显学；《周易》对天文、历法、数学、史学、文学、医学、政治、伦理、乐律、建筑和军事等领域的研究，而受到西方各国的极大关注；古典诗词的文采和魅力在东亚各国曾一度成为人人追求的风雅。中华民族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曾令许多异域民族叹服不已。

中国优秀文化和文明精神的传播，让文津讲坛充满了活力。读者神情庄重和心藏渴求的眼神告诉我们：他们对中华文化大历史和对民族大文化有着沉甸甸的责任感，大家希望文津讲坛守好这份基业，创造出新的辉煌。

4、文津讲坛中的世界精神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光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文津讲坛在讲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传播世界文明融汇其中。卞祖善先生的《怎样欣赏交响乐》《第三流派在中国》《芭蕾名作欣赏》《维也纳音乐会欣赏》等讲座，郑小瑛先生的《柴可夫斯基与他的悲怆交响曲》讲座，刘诗嵘先生纪念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的五次讲座，黄晓和先生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讲座，严良堃先生的《如何欣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讲座，吴祖强先生的《融汇东西、结合古今》讲座，向听众介绍了西方文化。著名学者柳鸣九先生在演讲《雨果的文学业绩与人格魅力》时，特别提到，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举办世界历史文化讲座，代表了我们的民族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达到的文明化程度和对世界文化持有的成熟见解。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使得世界文化丰富多彩而富有生命力，成为人类文化发展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化的借鉴与融合也是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任继愈先生说：“文化有持续性的特征，它没有‘暴发户’，没有哪一个国家一天之内可以成为文化大国。”要把文津讲坛办成传播高品位中华文化的新园地，成为社会大众提高文化品位、完善知识结构的大课堂，培养具有“文化自觉”的公众，需要长久坚持、薪火相传，让中国传统文化茁壮成长。